

J I A N G X I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中国共产党 防范执政风险研究

A STUDY ON THE PRECAUTIONS
FOR CPC GOVERNANCE RISKS

肖子良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J I A N G X I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江西师范大学博士文库专项资助成果

中国共产党 防范执政风险研究

A STUDY ON THE PRECAUTIONS
FOR CPC GOVERNANCE RISKS

肖子良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防范执政风险研究/肖子良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6
(江西师范大学博士文库)
ISBN 978-7-5203-2600-1

I. ①中… II. ①肖… III.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
研究 IV. ①D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0478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1.75
插 页 2
字 数 301 千字
定 价 9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防范执政风险的思想基础、历史考察及 基本经验	36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防范执政风险的基本理论	36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关于防范执政风险的 思想及实践	49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防范执政风险的基本经验	77
第二章 世界执政党防范执政风险的经验借鉴	89
第一节 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分析和教训	90
第二节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得失政权的经验、教训和启示	108
第三节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防范执政风险的经验和启示	121
第四节 西方发达国家执政党防范执政风险的经验和启示	129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风险及成因探究	145
第一节 国际风险的主要表现及成因	145
第二节 国内风险的主要表现及成因	162
第三节 党内风险的主要表现及成因	202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防范执政风险的对策分析	229
第一节 创新执政理论，为党长期执政建立强大的思想理论基础	229
第二节 完善执政方式，为党长期执政提供科学的方法和途径	242
第三节 巩固执政基础，为党长期执政筑牢人民根基和力量	254
第四节 提高执政能力，为党长期执政打好自身素质基础	268
第五节 健全执政体制，为党长期执政提供制度保障	292
第六节 提升执政绩效，为党长期执政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300
第七节 优化执政环境，为党长期执政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308
结 语	323
主要参考文献	325
后 记	344

绪 论

一 选题背景和意义

(一) 选题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风险和挑战。胡锦涛同志在201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①这一论述准确判断并直面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振聋发聩,使人警醒。

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

^①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第3版。

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居安思危、勇于进取，党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① 2012年1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访各民主党派，在民建中央，习近平谈到了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称其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② 如何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强大生命力，防范执政风险，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是摆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当前，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国内改革的新深化、党自身出现的新情况，使党执政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主要表现在：

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使党面临的风险和考验更加复杂。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这样的时代背景使我们党维护国家利益、捍卫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所面临的环境和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当前，经济全球化既反映了当今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状况，又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向全球扩张的集中表现。只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

要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只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发展，西方一些国家企图“西化”“分化”我们以实现扩张的企图便不会停止。此外，随着我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由国际新霸权主义、新强权政治和全球化引发的经济摩擦、政治对抗、文化腐蚀、恐怖主义等诸多国际性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家安全与稳定。我们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面对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绝对不能放松警惕，必须应对好各种风险和考验。

党的使命任务变化使党面临的风险和考验具有长期性。当前，我们党执政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使命任务和执政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客观上要求我们党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决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实践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是提高生产力水平、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的正确途径，但同时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风险和挑战。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源配置方式、社会结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深刻调整，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对党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和各类社会矛盾的能力以及化解各种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国内改革发展过程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党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动摇，进而威胁党的执政地位。

党的历史方位变化使党面临的风险和考验异常严峻。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

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①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从革命的环境转变为和平建设的环境，从封闭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迫切需要改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纯洁性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以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从历史上看，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比较好地解决了如何建设革命党的问题，但却在如何建设执政党的问题上走了弯路，甚至遭受失败，其主要原因还是经不起历史方位变化带来的各种考验。当前，面对新环境、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还存在不适应不匹配问题，党的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等。我们党所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和党的自身建设出现的新情况也使党面临执政风险和考验。

总之，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能否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征程中有效地防范和抵御执政风险，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前途命运和生死存亡，最终关系党能否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和执政目标。本书正是基于此背景展开的讨论和论述。

（二）选题的意义

防范执政风险，既是执政党建设中的一个理论问题，也是执政党执政实践中一个具体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这场广泛深刻的改革开放浪潮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利益格局经历着重大调整和变动，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增多，威胁党安全执政的因素明显增加，我们党执政面临许多新的、严峻的挑战和风险。认真分析和深入研究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风险，寻

^①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页。

找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对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维护国家安全稳定,防范执政风险、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1. 理论意义。

中国共产党防范执政风险问题研究有利于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特别是执政党建设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基本理论是指导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理论,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纷纷丧失政权的沉痛教训说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理论不能停滞不前,必须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执政风险是执政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研究中国共产党防范执政风险问题,分析和总结其规律,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理论的实践性和科学性,对于完善和丰富党的建设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2. 现实意义。

首先,从世界角度来看,在国际视野中,研究无产阶级政党防范执政风险问题,有利于推动国际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对防范执政风险的研究,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的社会主义力量,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其次,防范执政风险研究有利于增强党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执政意识,自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为实现党的执政目标和历史使命打下良好的基础。当前,党的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上是适应的,但在新形势下党内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一些党员干部意志衰退和精神懈怠的现象突出;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不强、脱离群众的情况还比较严重;发生在党员干部身上的腐败现象呈现多发易发态势;一些党员干部学习动力不足、执政能力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不适应等,这些现象和问题解决不好,将会削弱党的执政基础,

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展防范执政风险问题研究,有利于增强党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执政意识,有利于我们党认识和遵循政党执政规律,有利于提高党自身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增强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使我们党破解执政难题,实现执政目标。

最后,加强执政风险研究,对于我们党采取对策和措施防范执政风险、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长期稳固执政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执政地位日益巩固,但在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危害执政安全的因素层出不穷,当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仍然存在,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实现共同富裕任重而道远,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文明建设任务艰巨,重大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阻力较大,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这些问题都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前途。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防范执政风险的研究,更好地探索新形势下执政党建设的规律,采取防范执政风险的对策,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条件下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二 研究现状和研究述评

执政风险是指执政党面临执政地位丧失的一种可能的、潜在的危险。执政风险是当今世界政坛共同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同样面临着执政风险。防范执政风险,巩固执政地位,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中国共产党将长期面对并必须始终解决好的一个历史性课题。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和党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党执政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因此,在新形势下,我

们党必须高度重视防范执政风险问题,不断增强防范执政风险的意识,积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全面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化解执政风险,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

防范执政风险,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根本要求,也是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在新形势下,能否有效地防范和抵御执政风险,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关系到党的前途命运和生死存亡,最终关系到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防范执政风险进行了研究和探讨,现述评如下:

(一) 国外研究现状和述评

国外对中国共产党防范执政风险问题做专门研究的人不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处在转型期,海外一些专家和学者开始对中国社会存在的风险进行关注,出现了一些与中国共产党防范执政风险问题相关联的专题研究,如中共控制力问题、社会稳定问题、反腐倡廉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执政合法性问题、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问题等。

1. 关于中共控制力问题的研究^①。

“中共控制力”是国外学者的关注焦点和热点问题,通过考察党和国家以及党和社会的相互关系来解读中共控制力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国外学者认为,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力,主要表现在经济改革对于党的经济权力、意识形态和组织纪律的影响上。观点一认为,经济改革使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权力弱化。如魏昂德(Andrew

^① 参见闫健《海外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8期。

Walder)认为,共产党的权力和权威基于对生产资料的事实占有之上。对生产资料的事实占有使得党不仅控制了资源和机会,而且得以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渗透、控制和监管。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对中央计划经济的抛弃实际上瓦解了党的权力和特权的基础,尽管这种结果通常都不是有意为之的。^①观点二认为,经济改革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指出:“改革意味着执政者承认自己的体系出现了问题。因此,它们带来了广泛的幻灭。这对于共产主义体系而言是令人不安的,因为意识形态的真理在共产主义体系中居于核心位置”^②。观点三认为,改革开放后党内腐败现象的猖獗,表明党失去了对其成员的有效控制。如黎安友(Andrew Nathan)指出了党的意识形态衰落与腐败增加之间的联系,“合法的和非法的经济和社会行为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了,社会中逐渐出现了一种日益明显的失范感”^③。

2. 关于社会稳定问题的研究。

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些西方学者就提出,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一些社会紧张和冲突必然会加剧,并在中国政治中产生新的紧张和力量。如美国学者白思鼎(Thomas Bernstein)认为,“到21世纪初,社会的不安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日常特征”。因此,中国面临着“重大的社会管制危机”,并且“政府的失灵使矛盾变成对抗性”。^④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用多重复合的意识形态来满足不同的目标,党与政府、人大形成共同治国的和谐局面,但也存在各种干扰社会稳定的

^① Andrew Waldered,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 8.

^② Elizabeth Perry, “Intellectuals and Tiananme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an Aborted Revolution”, in *The Crisis of Lenin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Left: The Revolutions of 1989*, edited by D. Chiro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pp. 142-143.

^③ Andrew Nathan, *China's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03.

^④ 杜鸿林、王其辉:《国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述论》,《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因素和问题。如2004年由丹麦学者K. E. 柏思德 (Kjeld Erik Brodsgaard) 和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合编的《回归政党：如何治理中国》 (*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 How China is Governed*, 2004), 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国家和社会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并考察中共的转型及其转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如中共在地方的权力仍然稳固但缺乏效率, 中共在社区机构中的角色并不明确, 在地方上证明中共的合法性仍是其面临的重要任务, 中共需警惕向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转型等。^①

3. 关于反腐倡廉问题的研究。

在国外学者看来, 尽管中国从腐败产生之日起就发动了反腐败斗争, 但是仍然难以阻止腐败的发生。腐败问题是中国改革的一大挑战, 腐败问题是中国改革的“致命弱点”, 它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生死攸关的合法性危机^②。如日本学者香川正俊在其著作《中国共产党与政治、行政、社会改革——贫困、差距、腐败、人权》(日本御茶水房出版社2008年版)中试图阐明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并通过中共及各级人民政府谋求解决的方针和政策, 分析探讨中国政治、行政以及社会改革的问题, 作者认为“最了解中国面临的问题及其严重性的, 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和它的政府本身”。作者在第3部分探讨了中国阶层分化和有关贫困、反腐败政策等问题, 作者认为, 中国的阶层分化可分为城市与农村的落差, 农村比较贫困; 同时城市内不同阶层之间的落差, 包括下岗工人、农民工与一部分富裕阶层之间的矛盾, 体现在社会保障、教育、福利等很多方面, 其中不恰当的收入分配是重要因素; 另外, 还包括贪污腐败等问题, 作者指出, 如果不切断私营企业家与党和政府干部之间的连带关系, 是无法解决

^① 参见潘世伟、徐觉哉主编《海外中共研究著作要览》,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第455—461页。

^② Tony Saich,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 London an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 330 - 336.

这些问题的。^①

4. 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

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 在其专著《中国共产党: 收缩与调适》(2008) (吕增奎、王新颖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年版) 中指出, 中共在理论武装方面具有一定的调整和适应能力, 经常发动“意识形态运动”, 提出新的意识形态概念, 因而其理论武装能力很强。2008 年德国学者 F. 哈尔迪希 (Falk Hartig) 在其著作《今日中国共产党: 从革命党到改革党》(*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Chinas heute: Von der Revolutions- zur Reformpartei*, Campus Press, 2008) 的第 6 章“21 世纪初中共的自我理解和意识形态”中指出: “中共的发展也体现在理论—意识形态的转变上, 也就是在改革进程中努力使自身的意识形态去适应现实: 选择了一条意识形态由列宁主义逐步转向民族主义的现代化之路, 努力提倡社会主义、党的领导、现代化和国家利益的相统一。这种理论—意识形态上的转变与创新, 也帮助中共巩固了自身的地位和权力。”^②

5. 关于执政合法性问题的研究。

执政合法性是海外学者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合法性理论是西方研究执政党问题的一个基本理论, 他们往往根据合法性的强弱来判断政党执政基础稳固与否。西方学者把合法性理论运用到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中, 认为自从 1978 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执政合法性基础的转变: 第一次发生在 1978 年,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从意识形态和道德激励转向经济表现和物质激励; 第二次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逐渐转变为经济增长、稳定和民族主义^③。如 2009 年英国学者 K. 布朗 (Kerry Brown) 所著《朋友与敌人: 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和

^① 参见潘世伟、徐觉哉主编《海外中共研究著作要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500—504 页。

^② 同上书, 第 489—494 页。

^③ 刘贵丰:《海外学者看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学习时报》2012 年 11 月 5 日第 5 版。

未来》(*Friends and Enemie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them Press, 2009), 该书第5部分和第6部分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以及将来要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新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存在许多挑战,其中经济上过于依赖制造业和出口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如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等,如果处理不好,将会转化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都会影响中共的执政地位。K. 布朗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时期,中共的合法性可以依赖于革命所带来的遗产,但是作为由革命党转变而来的执政党,中共必须领导好经济建设,所以中共当前能否继续保持执政地位,关键的问题是能否带领中国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实现由工业经济向知识型经济的转变,这是新时期中共的合法性所在。^①

6. 关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的研究。

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并分析了其原因。从风险来源和类型的角度,美国教授托尼·赛奇在2001年出版的《中国政治与治理》一书中指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风险挑战有四个方面:一是环境恶化问题,二是党内腐败以及责任制缺乏的问题,三是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四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带来的风险危机。

从法制建设存在的风险角度,曾任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法国学者让·皮埃尔·卡贝斯(Jean Pierre Cabestan)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障碍、压力和风险》(《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能否推进和实现法治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面临的挑战。他认为,中国要建立真正独立的司法体制和法治社会将受到风险的阻挠,这些困境分为三种:一是来自官僚或者个人对新法规和中央建立的司法制度的抵制;二是来自中国政治体制内所施加的规则和程序的限制;三是财政和人

^① 参见潘世伟、徐觉哉主编《海外中共研究著作要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4—518页。

力资源的缺乏，党内的腐败问题和地方保护主义。

从一党制的合理性角度，德国学者杨·威尔戈斯的著作《社会多元化的挑战——1990年以来共产党的后继党的发展道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1期）中，在吸收和借鉴东欧一党制得失的基础上，指出了当前中国共产党一党制面临的挑战，即来自于社会多元化与经济现代化的挑战。对此他表示谨慎的乐观。他认为，当今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形势与20世纪80年代东欧共产党相比要有利得多，只要能够解决社会多元化和经济现代化带来的挑战，那么一党制是能够在非西方社会的背景下长期存在的。

从执政风险的角度，瑞典学者玛利亚·埃丁在2004年的文章《重塑共产主义政党和国家：中国的基层干部责任制》（《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1期），通过对中国的基层干部责任制的个案研究，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并没有衰落，而只是改变了它的治理方式。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在转变治理方式：即从一些领域撤出的同时，又在另外一些领域重新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控制和监管的性质已经从微观层面转移到宏观层面。党和国家正在使自己从一些职能中摆脱出来以便能有效地履行其他职责”。德国著名专家托马斯·海贝勒教授在《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适应”执政风险有中国模式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历了‘转型’‘巩固’两个阶段后，已经进入了‘适应’阶段。这一阶段有五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意识形态作用减弱。这实际上并非是政权衰退而是政治稳定的一种征候；二是新兴的社会力量，如企业家、中产阶级等的出现。这要求党在社会内部重新定义自身的角色；三是新政治精英出现；四是批判性知识分子阶层再次出现。这个阶层不是反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而是试图改善这个体制的结构和治理能力；五是地区与跨地区的社会集团和组织日益要求参与和影响政治体制。”